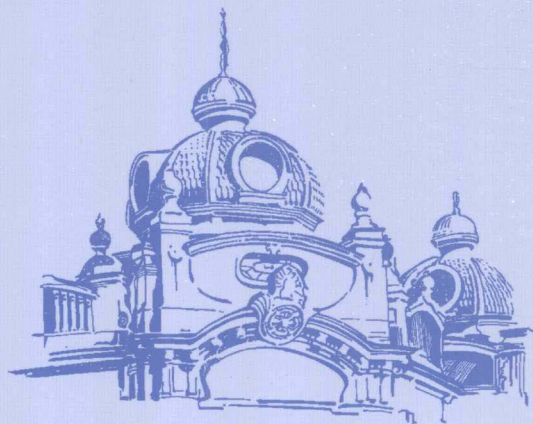


王宏志◎主编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翻译研究中心◎主办



STUDIES IN
TRANSLATION
HISTORY 2012

翻译史研究 20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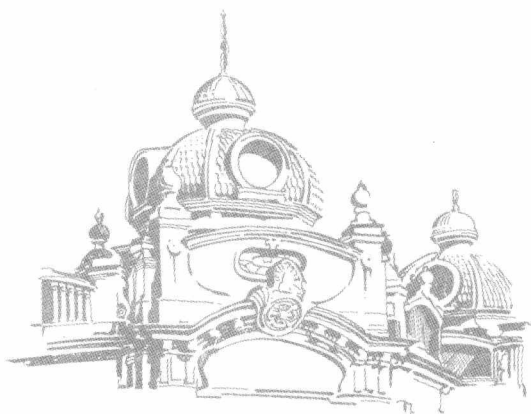
本书为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研究中心的学术论文集，以“翻译史研究”为专题，收录了众多学者在该方面的最新研究成果。

復旦大學出版社

翻譯研究中心
Research Centre for Translation

第二輯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翻譯研究中心 主辦



STUDIES IN
TRANSLATION
HISTORY 2012
翻译史研究 2012

王宏志 主编



復旦大學出版社



翻譯研究中心
Research Centre for Translation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翻译史研究. 2012/王宏志主编.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2. 10
ISBN 978-7-309-09213-4

I. 翻… II. 王… III. 翻译-语言学史-研究 IV. H059-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16426 号

翻译史研究(2012)

王宏志 主编

责任编辑/余璐瑶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200433

网址: 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86-21-65109143

上海华教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87×960 1/16 印张 22 字数 351 千

2012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9-09213-4/H·1990

定价: 40.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翻译史研究

Studies in Translation History

主办单位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翻译研究中心

出版及发行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

主 编

王宏志 WONG Wang Chi Lawrence

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研究中心

副主编

关诗珮 KWAN Sze Pui Uganda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中文系

学术委员会(以姓氏拼音排序)

陈思和 CHEN Sihe

复旦大学中文系

黄克武 HUANG Ko-wu

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

胡志德 Theodore D HUTERS

加州大学洛杉矶校区亚洲语文及文化系

王德威 David Der-wei WANG

哈佛大学东亚文化研究系

王宏志 WONG Wang Chi Lawrence(召集人)

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研究中心

王小明 WANG Xiaoming

上海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

邹振环 ZOU Zhenhuan

复旦大学历史系

编辑委员会(以姓氏拼音排序)

朱志瑜 CHU Chi Yu

香港理工大学中文及双语学系

关诗珮 Uganda Sze Pui Kwan(执行)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中文系

李奭学 LI Sher-shiueh

台湾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

沈国威 SHEN Guowei

关西大学外国语学部

沈安德 James ST. ANDRÉ

曼彻斯特大学东亚系

王克非 WANG Kefei

北京外国语大学外国语言研究所

叶凯蒂 Catherine YEH

波士顿大学现代语言及比较文学系

出版助理

吕汇思 LUI Wui Sze

目 录

第一次鸦片战争中的译者

下篇:英方的译者 王宏志 1

大英帝国、汉学及翻译:理雅各与香港翻译官学生计划(1860-1900) 关诗珮 59

19 世纪至 20 世纪的英华辞典与英和辞典的相互影响

——中日近代新词往来的渠道之一 陈力卫 102

广告与跨国文化翻译:20 世纪初期《申报》医药广告的再思考 黄克武 130

宫崎滔天与 20 世纪初期中国的“革命想象”:以章士钊“译录”的

《孙逸仙》为中心 潘光哲 155

台湾日治时期的译者群像 杨承淑 178

译学新芽

“上帝”的争端

——理雅各与译名之争的余波(1877-1880) 潘琳 218

《爱的教育》前一章:从 *Cuore* 到《馨儿就学记》的转译史 陈宏淑 243

外国翻译史论文选译

近代早期欧洲的多种翻译文化

彼得·伯克(著) 关诗珮(译) 274

马来世界里的翻译

——不同的群体,不同的议题 多丽丝·叶杰姆斯基(著) 陶磊(译) 309

稿约 344

《翻译史研究》撰稿体例 345

第一次鸦片战争中的译者

下篇:英方的译者

王宏志*

摘要: 本文为〈第一次鸦片战争中的译者〉的下篇,集中处理为英方服务的几位译者,除分析他们的背景、能力和局限外,更尝试展示他们在这场战争中所扮演的不同角色。由于他们所担负的任务远远超过一般的翻译和沟通工作,且积极地介入实际的战事,直接参加和负责双方的和平谈判,因而他们在整场战争中举足轻重。文章最后部分讨论这些译员的中文及翻译水平,虽然不能作深入分析,但由此联系到英国政府对于与清廷有效沟通的顾虑,最终要在 1858 年的〈天津条约〉加入条款,确定以后尽管会为英方文书提供中译,但一切要“以英文作为正义”。

关键词: 译者;第一次鸦片战争;马儒翰;郭实腊;罗伯聃

The Translators/Interpreters In the First Opium War, 1839-1842

Part Two: Translators/Interpreters of the British Camp

Lawrence Wang-chi Wong

Abstract: This present paper is Part Two of “The Translators/Interpreters in the First Opium War, 1839-1842”, handling mainly the translators/interpreters who

* 王宏志,工作单位: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系及中国文化研究所翻译研究中心,电邮地址:lwchwong@cuhk.edu.hk。

served the British during the Opium War. The backgrounds, activities and contributions of individual translators/interpreters will be analysed to portray a comprehensive picture of the multiple roles played by them in this important historical event. The last section touches on the language and translation ability of the interpreters, relating it to the concerns of the British government for an effective communication with the Chinese government.

Key words: Translation studies; the First Opium War; John Robert Morrison; Charles Gutzlaff; Robert Thom

—

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的译者——上篇：中方的译者〉一文里，我们指出过清廷一直轻视译者的角色，甚至对于能够充任翻译的人抱有极大的猜疑和敌意，在鸦片战争中不但没有派遣通事协助沟通或收集情报，就是在和约谈判中也没有翻译人员出席，以致处于一个十分被动的地位，最终连和约的中文版本也没有参与起草或翻译^①。但另一方面，具备丰富海外扩张经验的英国，在与中国接触交往的时候，一直都很关注解决语言障碍的重要性。早在明末 1637 年第一次尝试与中国进行贸易时，带领船队的威德尔（John Weddell, 1583-1642）便根据当时其他欧洲国家来华贸易的惯常做法，带同了一名懂葡萄牙语的商人一起出发，负责翻译的工作；此外，1872 年在筹组第一次来华使团的最早阶段，马戛尔尼（George Lord Macartney, 1737-1806）即派遣副使斯当东（George Leonard Staunton, 1737-1801）遍寻整个欧洲大陆，希望能找到合适的译者^②。不过，由于客观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当时并没有多少英国人能够学会中文，无论威德尔还是马戛尔尼都不能找到理想的译者，以便更好地解决语言障碍的问题。更严重的是在广州制度（Canton

① 王宏志：〈第一次鸦片战争中的译者：上篇：中方的译者〉，《翻译史研究（2011）》第一辑（2011）（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页 82-113。

② 有关 1637 年虎门事件的译者和翻译问题，可参王宏志：〈通事与奸民：明末中英虎门事件中的译者〉，《编译论丛》第 5 卷第 1 期（2012 年 3 月），页 41-67。有关马戛尔尼来华使团的翻译问题，可参王宏志：〈马戛尔尼使华的翻译问题〉，《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63 期（2009 年 3 月），页 97-145。

System)下英国东印度公司与当地官员的沟通,他们被迫聘用无论在语言能力还是专业操守都有严重问题的通事,结果,在东印度公司的文书档案里,我们经常见到他们对通事的翻译水平和服务的不满和投诉^①。

在这个问题上,一个重要转折点是第一位新教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 1792-1834)来华。关于马礼逊自己怎样在极其艰苦的境况下学习中文,受聘于东印度公司做中文秘书及翻译,然后为中英交往作出了重大的贡献,我曾在另一篇文章详细论述^②。不过,另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是他在东印度公司里开设中文班,教导公司职员学习中文,这为英方培育了新一代的翻译人员,影响是至为深远的^③。

我们知道,在马礼逊以前,东印度公司中最早学会中文的是洪任辉(James Flint)。1736年(乾隆元年),他乘船来到中国,学会了中文,愿意为东印度公司服务,只要求公司资助继续学习中文所需的经费,最后东印度公司的管理委员会为他提供了150两^④。1746年,他开始为东印度公司担任翻译工作^⑤,在提供过好几次翻译服务后,洪任辉得到赞赏,他们特别提到在1755-1757年间英商船几次到宁波成功进行买卖的事件中,洪任辉担任了主要的翻译职务,“如果没有洪任辉先生的帮助,就不会取得成功”^⑥。不过,乾隆在二十二年十一月七日(1757年12月20

① 一个最典型的说法是:

要透过行商把一封信忠实地翻译出来,当中的困难几乎是无法逾越的。无论什么时候,我们只能够大约领会其中的意思。

Hosea B. Morse, *The 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 1635-1834*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26-1929), Vol. III, p. 7.

② 王宏志:〈“我会穿上缀有英国皇家领扣的副领事服”:马礼逊的政治翻译活动〉,《编译论丛》第3卷第1期(2010年3月),页1-40。

③ 关于东印度公司里教授中文的情况,最精辟及完整的论述来自 Susan Reed Stifler, “The Language Student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s Canton Factory”, *Journal of the North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Vol. 69 (Shanghai: Kelly & Walsh, 1939), pp. 46-82。另外有关马礼逊自己作为中文老师,可参苏精:〈马礼逊的中文教学:英国第一位中文教师〉,《中国,开门! 马礼逊及相关人物研究》(香港:基督教中国宗教文化研究社,2005),页43-64。

④ Morse, *The 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 1635-1834*, Vol. I, p. 276.

⑤ Ibid., p. 287。不过,这并不是该公司内固定的翻译职位,他获委任为 Linguist,且以来华船只数目来订定薪酬——每艘船的翻译报酬是90两(同上)。

⑥ Ibid., Vol. V, p. 28.

日)明令所有洋船以后“不得再赴宁波”^①,但洪任辉在翌年6月仍坚持再闯,除宁波以外,更乘船到天津呈诉,控告粤海关勒索,投诉广州通商环境恶劣,并要求宁波正式开埠,改变一口通商格局。尽管朝廷也对勒索及广州的外商情况展开调查,且惩处了粤海关总督李永标,但对洪任辉破坏通商制度,清廷采取了强硬的手段对应,处死代写状文的刘亚匾,并在澳门圈禁洪任辉三年,刑满后于1762年11月被逐离中国,永远不准重来^②。就是这样,东印度公司内唯一懂中文的职员也不能在广州工作了^③。

洪任辉以后,我们要待到差不多40年后小斯当东(George Thomas Staunton, 1781-1859)的出现,东印度公司才再有自己懂中文的雇员。1792年,年仅11岁的小斯当东,以马戛尔尼侍童(page)身份跟随使团来华,在旅途上跟随译员开始学习中文,进步神速,后来更分担了使团部分的翻译工作,且在谒见乾隆时因为能直接以中文交谈而得到奖赏,乾隆从身上拿下荷包赠送^④。1800年1月,他重回中国,在广州东印度公司出任初级书记(junior clerk),并在1802年回国后重来时升任书记,又担任公司译员,被认为是当时中文水平最高的英国人,后来除了担任阿

① 《清实录》(北京:中华书局,1986),第一五册,高宗实录(七),卷五五零,页1023。

② 关于这次中英近代交往史上所称的“洪任辉事件”,中国方面的原始资料见〈乾隆二十四年英吉利通商案〉,收《史料旬刊》第三期,页天九十一至天九十五、第四期,页天一百十三至天一百二十五、第五期,页天一百五十六至天一百六十二、第六期,页天一百九十八至天二百及第九期,页天三百零四至天三百一十;另可参陈东林、李丹慧:〈乾隆限令广州一口通商政策及英商洪任辉事件论〉,《历史档案》1987年1期(1987年2月),页94-101;朱雍:《不愿打开的中国大门——18世纪的外交与中国命运》(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9),页64-76;Edward L. Farmer, “James Flint versus the Canton Interest (1755-1760)”, *Papers On China*, Vol. 17 (Dec 1963), pp. 38-66。

③ 其实,除了洪任辉以外,东印度公司在当时还有派遣及资助其他职员学习中文的。根据马上(H. B. Morse, 1855-1934)的纪录,东印度公司曾在1753年出资派遣了两名雇员 Thomas Bevan 及 Barton 到南京学习中文。Morse, *The 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 1635-1834*, Vol. II, p. 51 & Vol. V, p. 27。不过,这名 Barton 并不见于该书的其他部分,我们不知道他后来还有没有学习中文,又或是作了什么贡献。另一方面,Thomas Bevan 则一直留在东印度公司,直至1780年才以健康理由申请回英国。Ibid., Vol. V, p. 61。在该公司的纪录中,东印度公司董事局主席碧古(Frederick Pigou, 1711-1792)在1756年2月14日所作的报告中指出:Thomas Bevan 学习中文进步得很快,且品行良好,在几年后会对公司作出重要的服务。Ibid., Vol. V, p. 27。但应该指出,这是在洪任辉被圈禁以前的事情。在其后的纪录里,我们不再见到他参与翻译活动的报导,却出任了东印度公司的特选委员会成员。Ibid., pp. 107, 123, 130, 133, 144, 149 and 165。

④ George Staunton, *An Authentic Account of an Embassy from the King of Great Britain to the Emperor of China* (London: W. Bulmer & Co., 1798), Vol. II, p. 234。

美士德使团的副使外,更翻译出版《大清律例》^①,成为英国早期的“中国通”,对当时英国对华政策以至汉学的成立都有重大的贡献和影响^②。此外,在这期间,东印度公司还聘用过两名译员:曼宁(Thomas Manning, 1772-1840)及西班牙籍的罗德里戈神父(Father Padre Rodriguez),前者更曾以译员身份参加过阿美士德使团,而后者则在1804年至1809年间在东印度公司工作。但曼宁从不打算长期留在广州,而是四处寻找到中国内地的机会,最后在1810年2月离开中国,而他的译文也曾受到批评^③;另一方面,罗德里戈神父也不是全职的译员,且曾因为替英国人做翻译而遭中国官员拘捕^④。在这情形下,马礼逊在1809年正式加入东印度公司,成为全职的译员后,情况便很不同,中英交往的沟通模式起了很大的变化,他们再不需全面倚赖通事来跟中国官员沟通,而更重要的是马礼逊提出一个更长远解决问题的方法,就是在东印度公司内开设中文班^⑤。据学者统计,从马礼逊在1809

-
- ① George T. Staunton, *Ta Tsing Leu Lee: Being the Fundamental Laws, and a Selection from the Supplementary Statutes, of the Penal Code of China* (London: T. Cadell & W. Davies, 1810);有关斯当东翻译《大清律例》,可参 James St. André, “‘But Do They Have a Notion of Justice?’: Staunton’s 1810 Translation of the Great Qing Code”, *Translator*, Vol. 10 No. 1 (April 2004), pp. 1-31; Glen H. Timmermans, “Sir George Thomas Staunton and the Translation of the Qing Legal Code”, *Chinese Cross Currents*, Vol. 2 No. 1 (Jan-Mar 2005), pp. 26-57; 侯毅:〈乔治·托马斯·斯当东眼中的《大清律例》〉,收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政治史研究室及苏州大学社会学院(编):《晚清国家与社会》(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页496-510。
- ② 关于斯当东的生平和贡献,可参 George T. Staunton, *Memoirs of the Chief Incidents of the Public Life of Sir George Thomas Staunton, Bart* (London: L. Booth, 1856); Lydia Leulla Spivey, “Sir George Staunton: Agent for the British East India Company in China, 1798-1817” (Unpublished MA thesis, Duke University, 1968); 游博清:〈小斯当东(George Thomas Staunton, 1781-1859)——19世纪的英国茶商、使者和中国通〉(国立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未出版硕士论文,2004); 游博清、黄一农:〈天朝与远人——小斯当东与中英关系(1793-1840)〉,《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69期(2010年9月),页1-40。
- ③ Morse, *The 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 1635-1834*, Vol. III, pp. 71, 103; 关于曼宁的生平,比较详尽的资料见 Clements Robert Markham, “Biographical Sketch of Thomas Manning”, *Narratives of the Mission of George Bogle to Tibet, and of the Journey of Thomas Manning to Lhasa* (London: Trubner, 1879), pp. 159-165。
- ④ 罗德里戈神父曾于1808年在澳门被中国官员拘捕,当时他正为英国海军司令 Drury 做翻译。对此,英国东印度公司极力出面营救,甚至以停止一切商贸活动作威胁,最终于1月10日获释。不过,由于澳门的中国官员及部分葡萄牙人对他心存怨恨,因此,东印度公司决定把罗德里戈神父送到巴西去,且为了感谢他多年来对英国人的忠诚、照顾公司的利益,更送了10 000元给他作报酬。参 Morse, *The 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 1635-1834*, Vol. III, pp. 92-93。
- ⑤ 1793年,东印度公司尝试把一名中国人聘到澳门去,教导职员中文。但这名中国人过于害怕,不肯住在东印度公司的房屋,甚至不敢住在附近,也拒绝收取任何报酬。最后,公司选派了三名书记(writers)跟随这名中国人学习中文:Benjamins Travers, Thomas Charles Pattle 及 John Williams Roberts。Ibid., Vol. II, p. 209。

年开始在东印度公司任职并教授公司职员中文开始,到该公司在中国专利权结束的1834年的二十几年里,共有19名东印度公司书记在公司内学习中文^①,其中包括成绩最好、后来当上了香港总督的戴维斯(John Francis Davis, 1795-1890),另外还有我们在下文会提到的特选委员会主席马治平(Charles Marjoribanks, 1794-1833)及林赛(Hugh Hamilton Lindsay, 1802-1881,曾用胡夏米的中文名字)等。

在这情形下,当英国人第二次派遣使团来华时,他们的华语人才便相当充裕,随团正式担任“译生”的共有四人,更不要说还有副使小斯当东以及团里其他懂中文的成员^②,结果,英方主导了其中的翻译场合,清廷由始至终根本没有派遣通事来参与^③。不过,鸦片战争爆发以后,由于这场前后历时近三年的战争规模很大,且有不同的传译和翻译需要,因此,尽管他们已调动了所有可以参与翻译的人员,可是我们还经常见到前线军人在抱怨翻译人手不足,不知怎样和中国人沟通^④。据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 1812-1884)当时所作的一个估计,英方最少需要有五倍的翻译人员才足以应付这样一场战争^⑤。此外,由于正式开战的是英国

① Stifler, "The Language Student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s Canton Factory", p. 67.

② 副使小斯当东曾记录正式提供给中国朝廷的使团成员名单,其中四人列为“中文秘书”: "Messrs. Toone, Davis, Morrison, and Manning, Chinese Secretaries", 参 George Staunton, *Notes of Proceedings and Occurrences During the British embassy to Peking in 1816*, in Patrick Tuck (ed.), *Britain and the China Trade 1635-1842*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Vol. 10, p. 51。他们在中方的材料列名为“译生”:“米斯端”、“米斯迪惠氏”、“米斯玛礼逊”以及“米斯万宁”,〈英贡使等进表听戏筵宴瞻仰陛辞人数拟单〉,收故宫博物院(编):《清代外交史料》,嘉庆朝第五册(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年重印),页三一至三二,总页520-524。不过,担任使团副使斯当东的中文水平都比各人为高(除马礼逊外),而“医夫米斯彼耳孙”(Alexander Pearson),其实也是略懂中文的。关于各人中文水平的简略分析,见 Patrick Tuck, "Introduction: Sir George Thomas Staunton and the Failure of the Amherst Embassy of 1816", in Patrick Tuck (ed.), *Britain and the China Trade, 1635-1842*, Vol. 10, pp. xxii-xxiv。

③ 从刚知道使团要来访问开始,清廷便一直要求“慎选谙晓夷语夷字之诚实可信”的通事。参〈兼署两广总督广东巡抚董教增等奏英致浙江抚臣飭员查探英船并慎选翻译人员分送直浙片〉,收故宫博物院(辑):《清代外交史料》,嘉庆朝第五册,页三,总页465。但经过好几过月还是找不到,闰六月二十八日仍有奏片说“粤省通事未到”。〈直隶总督方受畴奏据天津道禀称英船五只移泊祁口及宁海海面片〉,同上书,页四十四,总页548。结果,英使团的马礼逊却因为“言语尚为通晓”而从开始便同时为中方官员做翻译。〈长芦盐政广惠奏拆阅英吉利贡使书信并传问译生各情形折〉,同上,页十二至十三,总页484-485。

④ "Hostilities in China: Communication for the Emperor's Ministers; the Queen's Plenipotentiaries; British Forces; the White Flag; and the Occupation of Chusan", *China Repository*, Vol. 9 No. 4 (August, 1840), p. 231; 关于鸦片战争期间英方译者的不足情况,可参关诗珮:〈征求译者! 征求译者! 鸦片战争译者不足与英国汉学的起源〉,将发表于《国际汉学》25期(2012年9月)。

⑤ S. Wells Williams, "A Chinese Chrestomathy in the Canton Dialect. By E. C. Bridgman", Part II,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XI No. 4 (April 1842), p. 223.

政府所派遣的远征军,很多东印度公司原来的职员并没有参与,且不少在公司专利权结束后早已回国,因此,在鸦片战争中担任英方译者的,主要并不是来自原东印度公司的。自1834年8月1日马礼逊病逝后,英国驻华商务监督的“中文秘书和翻译官”一职便由马礼逊的儿子马儒翰(John Robert Morrison,又作马礼逊、秧马礼逊、马礼训等,1814-1843)^①接任,而后来又委任了德国传教士郭实腊(Charles Gutzlaff,又译作郭士立、郭甲利、郭施拉等,1803-1851)^②,以及原为怡和洋行(Jardine Matheson & Co)工作的罗伯聃(Robert Thom, 1807-1846)为副翻译官。他们三人成为鸦片战争中英方主要译员。此外,我们还见到在澳门长大、能说流利中、英、葡文的费伦(Samuel Turner Fearon, 1819-1853)^③,曾经短暂到过中国、中文程度不大好的李太郭(George Tradescant Lay, 1799-1845),以及刚来到中国不久,但后来在中英交往史上扮演不同重要角色的麦华陀(Walter Henry Medhurst, 1823-1885),都在鸦片战争中出任英方的译者。

二

一般相信,英国第一任驻华商务监督律劳卑(Lord William John Napier, 1786-1834)在马礼逊去世后委任他“出色的后人”(“outstanding offspring”)^④马儒翰接任“中文秘书和翻译官”一职,其实这很可能不是他最理想的安排。律劳卑心目中的首选人物是郭实腊,只是郭实腊当时正跟随一艘鸦片商船杨格上校号

① 为统一起见,本文全用马儒翰。

② 正如庄永钦所考证,“郭实腊”是Gutzlaff自取的中文名字,“在英国伯明翰大学图书馆所收藏的郭实腊档案(Gutzlaff Papers)里,有两通英文书信,郭氏亲笔签名作‘郭实腊’。又在郭氏所撰写的《常活之道传》序末有‘郭实腊敬纂并序’,且有两方印,一方有‘郭印’字样,另一方则有‘实腊’字样”。参庄钦永:《郭实腊《万国地理全集》的发现及其意义》,《新甲华人史料考释》(新加坡:新加坡青年书局,2007),页259注。但在晚清中方档案中,倒是更常用郭士立的叫法。本文会全部采用郭实腊自定的汉名。

③ 长久以来,人们一直没有注意到费伦在中国近代史以至香港殖民地管治史、英国汉学史上的重要角色。南洋理工大学关诗珮教授连续撰写了几篇文章,详细讨论费伦的背景、事业及贡献。本文有关费伦的讨论,大都参照关诗珮的论文及其提供的材料,下文会详细征引,谨此致谢。

④ Lindsay Ride and May Ride, *An East Indian Company Cemetery: Protestant Burials in Macao*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236.

(Colonel Young)北上,不在澳门,所以才改聘马儒翰^①。

关于郭实腊的生平,不少中西方的学者已有介绍^②;另外,在他去世时,《中国丛报》(*The Chinese Repository*)也对他的生平有所报道^③,这里不再赘述一遍了。

郭实腊早年跟马礼逊是接触过的。1825年,他在伦敦遇上过马礼逊,使他产生了到东方传教的念头^④。1827年,郭实腊被派往爪哇,并开始学习福建话,翌年到达暹罗,在当地华侨社群中传道。1831年,他第一次随货轮来到中国,从海南岛一直北上,最远到达辽东半岛,沿途登岸传道,然后回到澳门,得到马礼逊的接待。由于当时所有外国人在中国的活动都只被限制于广州和澳门,郭实腊这次沿海北上的经历,使他声名大噪。1832至1833年间,他跟英国商人两次再乘船北上,更到过东北奉天地区沿海一带。这样,郭实腊完成了著名的三次沿海航行,后来更把这三次航行的经历出版成书^⑤。其实,郭实腊除了这三次航行外,接着还有过十数次沿着中国海岸的航行,只是他再没有发表或出版日志,我们无法具体知道他

① Peter Ward Fay, *The Opium War, 1840-1842: Barbarians in the Celestial Empire in the Early Part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and the War by Which They Forced Her Gates Ajar*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75), p. 71; 律劳卑当时曾这样说过:“我委任了他[马礼逊]的儿子,他会说流利的官话……郭实腊这时候不在这里,他在沿海地区传教。”录自 Priscilla H. Napier, *Barbarian Eye: Lord Napier in China, 1834, The Prelude to Hong Kong* (London: Brassey's, 1995), p. 134。

② 关于郭实腊生平一个较简单的介绍,见 G. B. Endacott, *A Biographical Sketch-book of Early Hong Kong* (Singapore: Ea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62), pp. 105-108; 而最早为郭实腊作传的是 Herman Schlyter, *Karl Gutzlaff als Missdionar in China* (Lund: C. W. K. Gleerup, 1946); 不过,专门研究郭实腊的学者是 Jessie Gregory Lutz。她写过好几篇有关郭实腊的文章,包括 Jessie G. Lutz, “Karl F. A. Gutzlaff: Missionary Entrepreneur”, in Suzanne W. Barnett and John K. Fairbank (eds.), *Christianity in China*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pp. 61-85; Jessie G. Lutz, “The Missionary-Diplomat Karl Gutzlaff and the Opium War”, 收李齐芳(编):《中国近代政教关系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淡江大学出版社,1987),页215-238; Jessie G. Lutz, “Karl Gutzlaff and Changing Chinese Perceptions of the World during the 1840s”, 收章开沅、马敏(主编):《基督教中国文化丛刊》第五辑(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页354-392等;然后在2008年出版了专书: Jessie G. Lutz, *Opening China: Karl F. A. Gutzlaff and Sino-western Relations, 1827-1852* (Grand Rapids, Mich.: William B. Eerdmans Pub. Co., 2008)。一篇与本文相关的论文是 John Nicolson, “The Reverend Charles Gutzlaff, The Opium War and General Gough”, *Missiology: An International Review*, Vol. 8 No. 3 (July 1985), pp. 353-361。中国大陆方面,较早比较仔细讨论郭实腊的有顾长声:《郭实腊》,《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页50-61。

③ “The Death of Rev. Charles Gutzlaff”,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XX No. 7 (July 1851), pp. 511-512.

④ Charles Gutzlaff, *Journal of Three Voyages Along the Coast of China in 1831, 1832, & 1833* (London: Frederick Westley & A. H. Davis, 1834), p. lxxxiii; Lutz, *Opening China*, p. 33.

⑤ Charles Gutzlaff, *Journal of Three Voyages Along the Coast of China in 1831, 1832, & 1833* p. 33.

究竟在这些其他航程里做了些什么,但肯定是跟鸦片贸易有关。由于他既会说官话,又懂福建话,且很快学会了一些别的中国方言,在当时被视为难得的人才(“a rare bird”)①,更不要说具有在中国沿海航行的丰富经验,因此得到在华外商争相邀请做向导及翻译。据说,鸦片烟商因义士(James Innes)曾说过,他愿意付出1 000元,聘请郭实腊为他做三天的传译②。

在过去的一些论述里,郭实腊还没有正式受聘作为英国商务总监的官方翻译人员前便已经为英国政府搜集军事情报,作为对华发动战争的准备③,这指的是郭实腊的第二次沿海航行。郭实腊在1831年的第一次航行后来到澳门,约两个月后便为东印度公司招聘,在该公司的“阿美士德爵士”号(*The Lord Amherst*)上当翻译,航行到中国沿海进行查察。一些学者说,这次航行的目的,是要“对各个港口的防务、商业进行刺探”,且收获丰富,搜集到大量的军事和经济情报④。

应该同意,“阿美士德爵士”号这次沿海航行,在中英鸦片战争前的历史中确实应该占重要位置。事实上,这次航行一直北上至上海、山东、威海卫,以至朝鲜和琉球,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值得特别关注⑤。但是,上引一些学者指责这次航行是间谍活动又是否正确?有关的论述经常以郭实腊自己的航海志里的文字来证明郭实腊参与了搜集情报的工作,其中一段征引的“证据”是这样的:

① Jack Beeching, *The Chinese Opium Wars* (New York: Hutchison & Co., 1975), p. 61.

② Michael Greenberg, *British Trade and the Opening of China, 1800-42*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1), pp. 139-140, 4.

③ 严中平(辑译):《英国鸦片贩子策划鸦片战争的幕后活动》,《近代史资料》1858年第4期(1958年8月),页2;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页30。

④ 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页30。

⑤ 有关这次航行,最详尽的记录确是来自郭实腊自己,参 Gutzlaff, *Journal of Three Voyages*, pp. 163-369;另外,同行的东印度公司大班、“阿美士德爵士”船长林赛也另行写了详细的报告,与郭实腊的报告合并成一书出版, H. H. Lindsay & C. Gutzlaff, *Report of Proceedings of A Voyage to the Northern Ports of China in the Ship Lord Amherst* (London: B. Fellowes, 1834)。中文资料方面,许地山从牛津大学波德利安图书馆抄录的《达衷集》第一卷,收有当时林赛沿途与各处官吏商人往来书信及文件,参许地山(1894-1941)(编):《达衷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31),页1-85。但有关这次航行的研究不算很多,中文论文见张德昌:《胡夏米货船来华经过及其影响》,《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1卷2期(1931年11月),收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主编):《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第一编,页93-112;英文方面则有 Immanuel C. Y. Hsu, “The Secret Mission of the Lord Amherst on the China Coast, 1832”,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 17 No. 1/2 (June 1954), pp. 231-252,但二者都算不上很深入的研究。又可参苏精:《文本与意象:印刷出版在阿美士德号事件中的角色》,《马礼逊与中文印刷出版》(台北:台湾学生书局,2000),页113-130。

我们巡视了[吴淞口]炮台的左侧,察看了这个国家的防务内部组织。炮台是一座极为巨大的结构。他们尽了最大的努力作了布置,可是最蹩脚的军队也能攻破它,因为他们不懂得炮台工事的技术,全部依赖于壁垒和围墙的厚度。……火药的质量低劣,炮的保养和使用都极坏,点火口太宽,制造得不合比例,我确信有些炮对炮手们要比对他们所瞄准的敌方更加危及性命。由于中国长时期享有和平,所有他们的军事工作已经陷于腐烂。……我们还巡视了兵营,……我们看到弓挂在墙上,但没有发现箭,据他们说,箭存放在对岸。他们的武器极不一致,有些兵士有大刀,其余的有火绳枪,少数有矛,等等。他们所属的分队用大字写在他们的外套上。……大部分军官都是没有受过教育的,是从部队里升上去的。……他们的工资很低,收入极少,他们的地位一点也不值得羡慕。许多将官都是满人,享有极高的工资。同有些文官一样,只要中国的这种和平局面继续下去,他们的官职不过是一个闲差使。^①

我们不是马上要否定郭实腊充当间谍的说法,不过,假如要从郭实腊自己的航海日志里去找寻证据,却是很愚笨的方法。郭实腊在那时候为什么会愿意公开自己的间谍身份,又或是将充当间谍的经历以及取得的资料公开书写发表出来?事实上,在那几十页的航海志里,几乎便只是找到这样短短的一段文字,可以说是比较正面地触及中国方面的军事资料,但那却是非常零碎,且不见得有什么机密的成分,实在没有需要劳师动众,专门聘请一名传教士作间谍出航几个月来偷取。对于中国海防或军事力量的相类报导,早见于马戛尔尼和阿美士德来华使团成员的日志或回忆录里,有些记载甚至远比郭实腊详细和露骨,但都只不过是他们来华后把所见所闻记录下来的惯常做法,而这些活动一直都是由朝廷派员安排及陪同下公开进行的,完全谈不上什么秘密的间谍活动^②。同样地,当时的《中国丛报》上也陆续出现有关中国军事力量的文章,比郭实腊所提的详尽和细致得多^③。如果

① 引文录自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页31,原文见 Gutzlaff, *Journal of Three Voyages*, pp. 293-297。

② For example, see J. L. Cranmer-Byng (Ed.), *An Embassy to China; Being the Journal Kept by Lord Macartney During his Embassy to the Emperor Ch' ien-lung, 1793-1794* (London: Longmans, 1961), p. 203.

③ A. S. Keating, "Military Skills and Power of the Chinese; Actual State of the Soldiery, Forts and Arms; Descriptions of the Forts on the River of Canton; Army and Navy of China; Modes of Warfare; Offensive and Defensive Arms, etc., etc.",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V No. 4 (Aug 1836), pp. 165-178.